

# 少陵心事凭谁问

——论文廷式诗歌对杜诗在接受

On Wen Tingshi's Reception of Du fu in His Poetry Creation

陆有富

LU You - fu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摘要]** 文廷式生当晚清动荡的时代, 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 其诗歌作品感世伤时、忧危念乱, 与国运民生密切相关, 真有少陵“诗史”之品格。无论从思想艺术方面来讲, 还是从兴发感动的作用来讲, 文诗都传达出一份深挚的志意和理念, 给人以强大的感发力量, 同时在模拟化用杜诗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姿态, 这与杜甫论诗主张及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志意和理念暗相契合。

**[关键词]** 文廷式; 杜甫; 诗史; 沉郁顿挫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597(2012)02-0043-06

**Abstract:** Wen Tingshi (1856-1904) live in late Qing dynasty, His poetry reflect turbulent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and reposing emotions of loyalty and resentment. as well as his profound sadness in unreciprocated ambition, It unfolds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ex inner world of the poet, which is interwoven by his feelings, values, thinking, desires, etc. It is the same as Du fu. In Wen Tingshi's poetry, whether in the art of thinking or in the function of moving and inspiring, conveys a deep aspiration and ideology that give people a strong stimulating energy; and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es the act of "learning from various masters" and of "not confining to a single standard".

**Key words:** Wen Tingshi; Du fu, History of poetry; Rhythm

我们审视古代文学发展史并将目光聚焦在晚清的时候, 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世变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盛况, 而这一切都与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经世致用的学术环境、感世伤时的士人心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廷式的诗词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文廷式(1856~1904), 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 号芸阁(一作云阁), 又号罗霄山人、芑德, 晚号纯常子, 江西萍乡(今萍乡市)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 二十年(1894)三月大考, 帝拔为一等第一名, 擢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其后又派稽查右翼宗学、教习庶吉士、协同内阁看本、署理大理寺正卿等职, 负一时重望。中日甲午战争时, 上疏请罢慈禧寿典, 奏劾李鸿章畏葸误国。二十一年(1895)秋, 襄赞康有为发起强学会, 支持光

绪帝亲政, 被慈禧革职, 永不叙用, 并驱逐出京, 漂泊江潭。戊戌政变, 遭到追缉, 避难湘潭, 后经汉口转移至上海。二十六年(1900)正月初十日, 应日本同文会之邀, 离沪东游扶桑。三月十二日, 归抵上海。之后往还于萍乡、长沙、南京、上海之间, 寄情诗酒, 三十年(1904)八月二十四日, 卒于萍乡家中。文廷式一生著述宏富, 涉及经、史、文学等诸多方面, 据考证有一百余种, 其中四十余种佚失。文廷式自负奇伟, 天才横溢, 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 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他一生的行藏用舍相绾结, 在其心灵和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投影。文诗抑扬时局, 针砭时弊, 寄托了个人忧危念乱的愤懑和壮志难酬的悲慨, 沉郁顿挫, 真有少陵“诗史”

**[收稿日期]** 2012-05-20

**[作者简介]** 陆有富, 男,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师, 文学博士。

之品格。更值一提的是,文诗创作无论从思想艺术方面来讲,还是从兴发感动的作用来讲,都传达出一份深挚的志意和理念,给人以强大的感发力量,同时在模拟杜诗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种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姿态,这与杜甫论诗主张及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志意和理念暗相契合。

## —

从文廷式对杜诗之模拟化用来说,文氏不仅强调对古典作品的尊崇和模仿,还特别醉心于对前人诗歌材料(语词、意义)的借鉴融化,尤其是杜诗。如“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出京作》)化用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中“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句;“无分麻鞋迎道左”(《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化用杜甫《述怀》“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句;“向来忧国泪,沾洒向空山”(《十月闻雁作》)化用杜甫《谒先主庙》“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句;“云中叫新雁,嗟尔稻粱谋”(《雄县道中时方有水灾》)化用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句“独惭除酒兴,未敢典朝衣”化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一》“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以上所列不难看出,文廷式在借鉴化用杜诗时绝不是字句、意思上呆板的模拟和承袭。他既能驱遣自如,又能翻新出奇,在传统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对杜诗进行点化、变异、翻新,如同己出,显示了对艺术传统的认同和超越。从上述所列举的情况来看,文廷式对杜甫特别偏爱。事实上也是如此,在用意方面,文廷式还多处运用杜甫的诗典,如“少陵生命托长镳”(《酬皮麓云同年》)出于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少陵漏雨欲移床”(《为冒鹤亭题其先世菊饮卷子卷初失去亡友江建霞得之以还鹤亭》)出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陵倚仗看鸡虫,何事经游泽国中”(《上元陈菴圃(忠倚)来湘,致友人书,欲解余厄,甚可感也。用余<有感>诗韵见赠,仍叠前韵答之》)出于杜甫《缚鸡行》;“莫因垂老话颠狂,子美诗中黄四娘”则是出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臣甫低头拜杜鹃”出于杜甫《杜鹃》一诗;而文廷式选择熔铸、点化杜甫的诗歌,不仅对其诗歌风格有重要影响,还能使其诗歌丰厚蕴藉,不失本色。

然而,文诗之艺术手法不仅停留在对杜诗语言

材料、句法意义的借鉴运用上,还表现在对杜诗作品艺术、内容上的突破与超越。模拟前人诗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顾炎武《日知录》),完全异于他人,则可能因其违背诗歌艺术规律而不成其为诗;完全同于他人,则可能丧失诗歌的艺术个性而不足以为诗。文廷式在《临帖》诗中也强调说:“不似何必临,太似恐无我。遗貌取其神,此语庶几可。”我们来看他的《和杜写怀二首》其一:

儒生亦何知,南北问方俗。路遥鸟翻倦,书重牛腰束。中原经乱后,十室渺丰足。羯獍商贾叹,斲削羸老哭。司农算琐屑,幽隐殊未烛。四郊况多垒,志夺卿士辱。倾国营骄军,刮血嗜鸞粟。起徒送骊山,征兵戍函谷。譬如伐条枚,不及待萋绿。小人竞利欲,达士媚幽独。治外气转虚,求径道逾曲。代斲非所怀,何人为司牧?

诗人在前四句抒写南北奔波之苦后,便转入对时局的评述和对朝廷腐败的抨击。“中原经乱后”四句写出了内忧外患情势下十室九空、民生凋敝的惨痛场面。接下来文氏将矛头直指腐败的八旗制度和黑暗无能的朝廷。全诗将古人古事、当前政局、自我胸怀融汇为一体,一气呵成。虽然题为步杜甫诗韵,但不为所囿,各有所怀。杜甫《写怀二首》在自述危苦后却分别以“曲直吾不知,负暄候樵牧”、“终契如往还,得匪金仙术”作结,表现出一种达观任运的情怀;而文诗则有意变化,改易原意,在忧时伤乱之感中表现了自己意欲奋起救世的情怀。文氏的《缚鸡行用杜少陵原韵》则是在杜诗的基础上广而申之。杜甫曾写有一首《缚鸡行》,是七言八句的古诗,前面写“家中厌鸡食虫蚁”,所以令“小奴缚鸡向市卖”。杜甫以为家人惜虫蚁之命,却“不知鸡卖还遭烹”,而鸡也是一条生命,所以杜诗结尾二句乃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将人世间的得失利害都投注于滚滚的“寒江”之中了,把不尽的感慨从不言中揭示出来,给人一种言外的效果。而文廷式的步韵之作开篇就点明了人与鸡的得失,指出“鸡求苟活人得利”,但鸡终究免不了被“燂烹”的厄运,进而将这种得失归结于“造化赋形偶歉薄,为人豢牢岂殊缚”,所以结尾二句云“吾将使鸡化凤凰,来集梧桐在阿阁”,表现出了一种脱然跃起的精神,抛开对这种得失利害的思考,而寻求一种解决的

办法,与杜诗结尾相异趣。这里,文廷式借鉴了杜甫的构思而换用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进而将原诗的内容转易,表达出与杜诗截然不同的情怀。这种写法在文诗中不在少数。

音情顿挫亦是文诗艺术手法中值得一提的一个方面。杜诗音情顿挫的艺术特征为历代诗论家所称道。这得益于杜甫亲身的吟诵实践,杜诗有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可以看出吟诵对于诗歌之声情及兴发感动作用之传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廷式受到杜甫和他的老师陈澧的影响,亦注重诗歌创作之声情,其笔记、日记中多有对音律之学的阐述和探讨。在诗歌创作中,文廷式十分强调声韵节律的变化起伏。他曾说:“国朝诸先辈讲考据家,大抵以目治者多,而以口诵者少,故文式平浅,而诗亦变化无多。不可不知其弊也。”所以他要求作诗者“多读古文之名作,以求其神志气韵之所才。公开必读之上口,乃皆得一篇之益”,这样才能够使诗作言辞曲折变化,音律声调跌宕起伏,深具抑扬顿挫之姿,避免因单调平浅而缺少情韵生动之美。这并非是文廷式泛泛而谈,在其创作中亦展现了这一方面。如其《湘妃怨》:

洞庭何连绵,连绵八百里。上有青冥天,下有无尽底。天门龙飞不可攀,帝台杳邈非人间。月华夜堕江水寒,深林密箬闻啼鹃。九疑云隐神鱼哭,泪痕沁入苍琅竹。万岁千秋有尽期,哀音凄断南风曲。行吟过北渚,九辩空陈词。重华不可作,终古有余悲。

全诗以七言为主,首尾四句五言。四次换韵,平仄相间,音调悲怆急促与悠扬婉转相交替,表现得极为协调。音情顿挫,欲飞还敛,于抑扬起伏之中蕴含着沉郁的情思。再如长达八十二句的长篇歌行《相逢行酬赠重伯孝廉》,全诗一韵到底,首尾呼应,勾连接,一气呵成。清代马荣祖《文颂》有《顿挫》一品云:“气鼓斯行,势郁乃畅。见斯息机,弥复道上。水入罨塘,峡束惊浪。奋跃无前,控勒不放。万钧逆挽,玉钩力壮。戛摩啞哑,悬空激宕。”形象的描绘了那种“峡束惊浪”、欲扬还抑的激宕顿折和“万钧逆挽”的笔力,马氏所言是对文廷式此诗声情气韵的最好诠释。不仅如此,在声调方面,文廷式还在单句落脚字上、去、入三声的间隔运用和颠倒文句上强

调整奏的起伏变化,如其《雄县道中》:

燕赵积高地(去),今同泽国忧。  
连桥低浸水(上),高树上行舟。  
策叹河防拙(入),颜为道殄羞。  
云中叫新雁(去),嗟尔稻粱谋。

诗中单句上、去、入三声的间隔运用,形成了顿挫的节奏。尾联出句据上一联对句的粘对规则来看应为“平平平仄仄”,“云中新雁叫”亦符合此句格律,而文廷式颠倒文句,改为“云中叫新雁”,虽然没有使此句变为拗句,但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特定的情景与动态,即强调动词“叫”,而新雁的凄惨的叫声更能够凸显灾难的深重,这是文氏将其颠倒的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这样的倒装能使整个诗句显得劲健有力,跳宕多变,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所言:“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进而在语义上形成“语峻而体健”的特点,在音情上收到顿挫的效果。总之,此诗中,无论是上、去、入三声的间隔使用,还是诗句语词的颠倒运用,都增强了抑扬起伏的效果,有力地表现出诗人情系民生的悲郁情怀。这不能不说与文廷式在杜甫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注重音情声韵之美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

胡怀琛《读文道希先生遗诗》诗云:“见说诵诗闻国政,晚清作者抑何稀。今人只识黄公度,我欲兼称文道希。杜律乱离皆史乘,屈骚忠爱畏谗讥。此编百读应无厌,仅谓工诗却又非。”指出了文诗既有杜律诗史的品格,也有屈骚忠爱缠绵之旨。而这种诗史精神也使得其诗歌的内在风格趋向于沉郁一路。文廷式也曾自言“輿中读太白七古,其沈郁极处,则神气飞扬,知其笔意与余略相似也”。由此可知,文廷式的诗歌创作是以“沉郁”为尚的。众所周知,“沉郁”是杜诗的主导风格,杜甫在《进雕赋表》中也曾以“沉郁”自称。文廷式与杜甫虽然睽隔千载,但他们都生活在乱离时代,都目睹了社会之大动荡,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和志意,加之文氏对杜甫十分推崇,故其诗风不期然趋于一路。胡应麟《诗薮·内编》曾评价杜甫诗云:“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故绝不可及。”文廷式的诗歌在艺术成就上虽未能达到杜诗之成就,但从模拟学习杜诗的痕迹来看,同样做到了“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其“本

调”一如杜诗之“沉郁”，成为他诗歌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成功的主导风格。

最能代表文廷式沉郁风格的作品当推他的七律。从体式上来说，七律之难作，诸家早有定论。胡应麟曾说：“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冒春荣也说：“七律平叙易于径遂，雕镂失之佻巧，比无言为难。属对宜稳，遣事宜切，炼字宜老，音调宜高，而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葑原诗说》卷二）虽然七律写作时难度很高，但从整体的格局、炼字、炼意以及婉妍畅达、凝重浑雅的特点来看，七律还是最适合表达深厚的情感，少陵、义山的七律便是最为成功的例证。文廷式所作七律，虽难以达到少陵的艺术水平，但往往能得其佳处。文氏七律奇情壮采、情思沉郁，表达出深沉凝重、悲抑曲折的感情，成为他情感寄托最为深厚的诗体。其《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落花诗》十二首、《追忆》、《中秋夜作》、《江行舟中感事》、《幽人》、《唐宫》、《书愤》等都是风格沉郁、情思深厚的七律佳品。

首先，文廷式七律沉郁的风格体现在情感的内潜上。而这种情感内潜根柢于屈骚精神，并遵循着儒家传统诗教的“怨而不怒”之旨。它不同于感情的奔涌喷发，而是将满腔的郁怒、悲愤进行敛抑，凝聚于内心深处。如：“枉道漏天容补石，谁知沧海竟横流”（《读<元遗山集>》）、“长佩行吟非泽洋，短衣射猎想山阿”（《八表》）、“淮海微禽宁速化，江湖魏阙有余思”（《鹧鸪》）、“书史尽供愁里读，山河频向月中看”（《春感一首》）、“焚香犹见星环极，涉世深愁海扬尘”（《读<韦端己集>》）、“当日守蕲烦壮策，古来放屈有余悲”（《奉答李与九师》）、“坐倚危樯看北斗，沉忧不共海波还”（《江行舟中感事》）等诗句，其中所表现的情感皆忠厚缠绵，内潜而不发露，悲抑收敛而不愤感怒张。我们来看他的《出京作》一诗：

短发萧疏懒著簪，傍檐乾鹊语声侵。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白羽一挥犹想象，青山何处足登临。秦娥曲里销磨尽，汉阙唐陵草已深。

甲午海战之后，本有一腔热血的文廷式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后，就以“遇事生风，互相标榜，语多狂妄及与内监往来等罪由”，被逐出朝廷，永不叙用。而这一首诗便是文廷式削职南归出京时所作，诗中

之情感欲露不露，反复缠绵，令人无限低徊。首联出句化用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诗意，道出了出京时百无聊赖的颓唐心态，对句表面借乾鹊的聒噪之声衬托内心的烦乱，实则暗示自己因受人构陷而有此结局；颌联出句指甲午战败割地赔款议和之事，意即倾天下之铁难以铸成割地赔款、屈辱投降的大错，悲愤郁结；对句反用杜诗“心死著寒灰”（《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句意，表明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内心始终不改对国家的系念。颈联紧承上句而来，化用苏轼“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句意，意欲力挽狂澜，持危扶颠，但现在已经被削职，只能“想象”一下，抒发烈士壮心而已，情感郁结，跌宕起伏；而此联对句更显沉痛。“青山何处”用问句的形式道出了当时中华大地被侵略瓜分的状况。诗人在《芸阁偶记》中也曾指出：“数年以来，失胶州，失旅顺，失长江之利。东三省隐于俄，广西、云南隐于法；江浙属英，闽属倭。”面对神州大地被列强瓜分豆剖的情状，诗人怎能忍心去登临纵览这破碎的山河？此句写来悲壮苍凉，慷慨生哀。尾联登临凭吊，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悲壮气象，道出了内心幽咽悲郁之情，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也揭示出大清陵夷的信息。全诗中间两联抑扬起伏，由错之大到心之热，由为国效力到忧世伤时，情感显得沉潜悲抑，而结尾之“销磨尽”、“草已深”，借古抒怀，使情感更加凝重深沉。纵观全诗，抑扬相间，起伏跌宕，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郁勃之气，是文廷式七律中表现沉郁风格的典型之作。再如《中秋夜作》：

桂魄销沉夜气寒，螭龙愁掩水晶盘。山阳下国成名异，湘水微波寄迹难。海阔尚容精卫塞，心孤惟共晚枫丹。不须更听邻家笛，白露庭楸恨自漫。

此诗作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情调低回哀婉，更甚于上一首。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出面“训政”，维新变法以喋血告终，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八月初十日，慈禧密令缉拿文廷式；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殉难。此时，文廷式正在寻找逃难之所，故诗中有“湘水微波寄迹难”之语。中秋月圆之夜，本是万家团圆之时，而诗人却在逃难隐匿，故而此诗开篇便以“销沉”、“愁掩”等字眼营造出月华惨淡、清冷凄苦的氛围。颌联借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之典影射维新失败，慈

禧太后复出夺权,并将光绪帝囚于瀛台的现实。而此时,自己在内廷的严令缉拿之下正四处奔逃。颈联用“精卫填海”的典故,暗示自己以逋逃之身,即便化身精卫,也不容填塞大海,虽有救国之策,却报国无门,惟有志节不移,丹心不改。尾联用“山阳笛”之典,嵇康、吕安遇害之后,向秀经山阳旧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追念亡友嵇康、吕安,“感音而叹”,作《思旧赋》。诗人借此典以表示对遇害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悼念。下句以景物着笔,收束全篇,指出不须“听鸣笛之慷慨”,眼前附着着白露的“庭楸”就已弥漫着哀怨和悲愤了。而这弥漫着的悲慨也笼罩着全篇,成为此诗的情感基调。此诗不仅哀悼维新烈士,也有个人忧生之嗟。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或以形象表现,或寄寓于事典之中,深沉愤郁,纯是情感内潜之作。

其次,文廷式七律沉郁的风格还体现在对国运民生的密切关注上。关注国运、关心民瘼缘于儒家对政治的深切关怀和“民胞与物”的仁爱精神,这类题材势必与忧愤深痛密切相连,而这样的忧愤深痛在文廷式的诗歌中却以深重之笔出之,“怨而不怒”,深具忠厚缠绵之旨。

文廷式的这一类诗歌在内容上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在情感上具有专一和执著的品格。即便是在困厄之时,也依然关注天下、国家、民生,所谓“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张戒《岁寒堂诗话》)。其“不才恐负文章责,经乱庶几民物苏”(《奉命典试江南出都门作》),正如题目所言,本年(1893)诗人被光绪帝钦定为江南乡试副考官,并奉派典试江南,诗人意识到这次出行的重大意义,虽充溢着自豪感和使命意识,但心中仍然系念着太平天国乱后江南民物的复苏情况,与“中原经乱后,十室勤丰足”(《和杜写怀二首》)同出一辙,都是对太平军余部动乱后民生凋敝的社会境况的关注。有鉴于此,文廷式还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四上《条陈养民事宜折》,针对当时的民情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安民的政策,如“蚕桑之利”,“棉花纺织之利”,“葡萄酿酒之利”,“畜牧之利”等富国养民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他关注人民生活的热切之情。然而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这只能是一些理想型的策略,根本无法实施,但文廷式忧国忧民的情怀于此昭然可见。

正是缘于这种情况,文诗七律中表现忧国忧民

的作品不在少数,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其诗歌沉郁的主导风格。如他的《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

谁言国弱更佳兵,其奈狂生愤已盈。铁骑晨冲丹凤阙,金舆宵狩白羊城。何人能屈横流决,今日真怜大厦倾。无分麻鞋迎道左,收京犹望李西平。

北狩烽烟越几时,西行旗鼓更堪悲。朝廷袞职尊蓝面,河朔军符授赤眉。目断汾流惟雁过,心惊沧海有龙移。孤臣泪洒荒江畔,忍痛新裁变雅诗。

淆潼形胜本天然,王气消沉九百年。但使东南漕底柱,漫愁烽火彻甘泉。羽觞露浥瑶池宴,仙掌晴开玉井莲。回首乌龙江上月,秋风清泪泣铜仙。

燕秦莽莽旧山河,到此谁挥落日戈。未必平原头可匣,更无延广剑横磨。漫天风雪尧年冷,误国衣冠宋鹤多。前后沉浮宁得料,霜晨揽镜未蹉跎。

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入寇京师,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面对当时的局势,诗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命笔感作,抒发对国事的忧虑。第一首以“铁骑晨冲丹凤阙,金舆宵狩白羊城”记庚子之难发生联军入侵、两宫西狩的情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诗人难以抑制的悲愤夺腔而出,“何人”“真怜”二句真挚深沉,写出了心灵深处的无奈之情。但诗人还是渴望像杜甫“麻鞋见天子”与肃宗共忧患一样与光绪帝共患难,虽然无分,其情可悯。结尾借“李西平”击败叛军,收复长安之事,希望李鸿章挥戈北上,收复京师。第二首前半叙述时政。诗人指出咸丰北狩、光绪西行,这接连不断的祸患根源就在于朝廷的软弱。“蓝面”借指洋人;“赤眉”代指义和团。朝廷的权臣一味尊崇奉迎洋人,义和团的兴起与被朝廷利用亦与此有关。后半部分抒发自己对光绪帝的怀念和自己作为“孤臣”的心绪,深沉哀婉,真挚动人。第三首从所写之“淆潼”、“甘泉”、“仙掌”等地理位置来看,似为光绪迁驻西安而作。前三联主要肯定了长安地理位置,盛赞长安过去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特色,指出即便是战争爆发,东南漕运也会确保长安作为大后方的安全性。甲午海战时,文廷式曾上疏力主迁都西北,其《广谪仙怨》一词便是针对迁都一事而发,认为光绪帝应效仿唐玄宗“早定入蜀之计”,“不然,灵武之众焉得嗣君,勤王之师,孰为

标目?”义理昭然。可是,如今帝都沦陷,帝后蒙尘,亡国在即,俄军又意欲乘机侵占东北,接连攻下黑龙江省城、吉林省城、奉天辽阳等地,而这里都是清皇室的发祥地、祖宗的陵寝处。所以尾联诗人以“回首黑龙江上月,秋风清泪泣铜仙”作结,既痛心京师的浩劫,更痛心作为清皇室发源之地的“黑龙江”被侵占,亡国之音甚为哀切。第四首,诗人面对山河破碎,亡国在即的局势,谴责和拷问了当时酿成庚子之乱的那些“误国衣冠”,亦暗伤国无人才,不能挥戈击退联军,收复京师。在国运沉扬的危急关头,诗人虽是在野孤臣,但也表示“未蹉跎”之意,欲奋起而有所为。

纵观这四首诗作,以时间为顺序(其一写庚子之乱爆发,其二写两宫播迁,其三写迁驻西安,最后写无人收复京师,反思恶果,并述己志),前后相互勾连承接,深刻地反映了庚子变乱后这一段时间(七月至九月)动荡的时局,表达了诗人的感愤与悲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组的四首诗中,每一首的结尾都有“卒章显志”的意味,前面无论是叙述还是谴责,结尾总是缠绵蕴藉,感怆深沉。“无分麻鞋迎道左,收京犹望李西平”道出了自己不能与光绪共患难的无奈之情和对收复京师的热切期望;“孤臣泪洒荒江畔,忍痛新裁变雅诗”与第三首尾联“回首黑龙江上月,秋风清泪泣铜仙”一样,皆哀感幽咽,具有浓厚的忧愤深痛的色彩;第四首尾联“前后沉扬宁得料,霜晨揽镜未蹉跎”则表达意欲振起之意,其意缠绵,写来沉痛。这样的写法布局能够使尾联如同豹尾,力重千钧,转折逆挽,更显沉郁。总的看来,四诗表达深沉、含意深刻、情调哀婉,是文廷式七律中表现沉郁风格的不可多得之作。其他如:“海水万重星四野,苍生系命好筹边”(《丙申元旦试

笔》)、“曾记敷衽谒虞舜,浮云西北此时心”(《幽人》)、“西狩鸾旗初返阙,东屯虎旅罢防秋”(《重至南昌百花洲作》)、“九死要须存国别,一生多误岂儒冠”(《舟中卧病》)、“原庙衣冠月出游,谁教洪潦浸神州”(《书愤》)皆表现出感伤时事、忧危念乱的情怀,进而奠定了文诗七律沉郁风格的主调。

总的来说,文廷式这一类情感内潜、情思沉郁的作品都与他的个人遭际和现实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所表现出的悲愤郁结、沉痛低咽,大都有一定的亲身感受,所以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真挚、浑厚顿挫的优秀诗作。杜诗中所蕴含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势必会引起经历与之相似的诗人在情感上的共鸣,文廷式生活在乱离的时代,同样有忠爱缠绵的忧国之心,其诗歌与杜甫等诗人的同类题材相比,无论是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情感表现的丰厚、真挚,文氏这一类作品亦毫不逊色。从以上对文廷式感伤时事、忧国忧民类诗歌的分析和文氏对杜诗的化用模拟来看,文诗不仅在内容、意境上与杜甫感伤世变的诗作呈现为一种共态,而且在语言和意旨上也多有隐括和化用,只不过在文廷式才力的驱遣之下已经脱化于他的诗作之中,不着痕迹罢了。可以说,文廷式与杜甫情感经历的相似性以及对其作品的推崇和整合,对文氏诗歌沉郁顿挫之风格特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不仅缘于文廷式有意学习杜诗和其转益多师、别有创获的诗学主张,更重要的是它与杜甫有着异代同心式的契合。另外,文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内容上也没有仅仅停留在一己之悲上,而是感世伤时、忧危念乱,与国运民生密切相关,与杜诗中所传达出的志意和理念相同。文廷式对杜诗接受和借鉴也为我们当下研究和学习古人作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 [参考文献]

[1] 文廷式著,汪叔子编. 文廷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文廷式著,赵铁寒编. 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131—140)[C].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影印本).

[3] 文廷式. 文廷式四种[M]. 台北:广文书局,1970.

[4]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 杨伦. 杜诗镜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叶嘉莹. 迦陵论诗丛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李春辉]